

孙 达 人 著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

第 一 卷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K201/4

孙 达 人 著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

第 一 卷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

第一卷

孙达人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 180,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

统一书号: 11094·37 定价: 0.87元

自序

DA70/11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当第一卷得以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想借这个机会，对读者所关心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略述一点自己的浅见。

目前，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或者说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两种观点得到了一些报刊的特别重视，因此，似乎大有被视为定论的趋势。但我仍以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根本无法解释人类历史前进运动的基本事实。

翻开世界历史，无论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来看，先进变落后，后进转先进的事实成千上万，层出不穷。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证明，人类最早的发祥地在非洲的东部，但谁都知道，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却是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如果说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末，为什么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地方不在社会生产最早发生，从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最早形成的非洲东部，却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呢？

事实上，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也只是暂时地占据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优先发展的地位。要是把情况说得简单些，后来把奴隶制及其生产推到了高峰的是新的历史主角——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罗马，连埃及、巴比伦后来都相继成为它们的臣属。如果说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末，为什么这世界三大文明古国竟无法保持自己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先进地位呢？

再拿我国来说吧，无论按照西周、战国还是魏晋说作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我国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并且无疑曾经在生产力方面居先进地位。但谁都知道，落后的欧洲却以跳跃式的步伐，一跃而变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先是英、法诸国，后来则是刚刚立国不久的美国，使新兴的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发展到了顶峰。如果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末，一度先进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而落后的欧美却首先进入资本主义，变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按照这两种观点，论理，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西方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首先在那里发生、发展，而且也最早在那里发生矛盾和尖锐地冲突；但谁都知道，社会主义恰恰首先发生在东方，先在落后的俄国，然后在更加落后的中国实现。如果说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末，这一切又将如何解释呢？

类似的事实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总之，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在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都只是暂时地保持过先进地位，而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和社会制度恰恰首先发生在那些当时较为落后的地区、民族和国家。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步伐决不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而是以先进变落后、落后转先进的形式，跳跃地前进着。我想，探求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恐怕不能回避或者无视人类历史前进运动中的这些基本事实。

（中国历史自汉以来的二千多年间，发展与停滞的更迭，先进和落后的演变，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沿着这样漫长而曲折的途径，形成了一部从先进的封建社会变为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变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汉以来的二千多年的历史，可以作为世界历

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在汉代，我国是世界上先进的封建国家。如果和当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相比，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还是社会经济结构，都处于领先地位。如果和我国先前相比，汉代也无疑比秦代有了发展。那末，我国历史在汉代的这种发展的动力究竟何在呢？

用生产力或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动力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创造出汉代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成就的汉人，他们所依赖的生产力正是他们的先辈——秦人创造的，而作为秦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直接结果，却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如果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末，为什么秦代不能创造出象汉代那样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如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什么秦末却出现社会生产的大破坏？为什么经过了秦末农民战争，汉初在同一种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却创造出了堪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成就呢？

同一种生产力水平，在秦末出现的是生产的严重破坏；在汉初却出现了生产的发展。这个事实不仅雄辩地证明：生产力或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还充分证明，离开秦末农民战争就根本无法说明汉初的生产发展。

拿汉代初期来说，当时生产发展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以冶铁为主的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使我国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获得了推广，其中原来比较落后的地区——巴蜀，兴起了大型的冶铁等手工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第二，我国经济区比之秦代有了很大的扩展，象江淮下游的吴国，汉初就变成一个“国用富饶”的地区；第三，在原先经济较为发达的黄河中下游，有了新的发展。据司马迁说：当时“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简言之，汉初生产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原先较为落后的江淮下游

和巴蜀地区的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在原先经济比较先进的黄河中下游的生产更上了一层楼。这二者其实都是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使大批农民摆脱了新封建王朝控制的直接产物。汉初摆脱了控制的农民被官方称为“亡人”或“奸猾人民”。汉王朝对他们的政策一是捕，曰“捕亡人”；二是骗，曰“复故爵田宅”。总起来就是所谓“招抚流亡”。据历史记载，“时大城民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逮文、景四五世之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可见汉初摆脱汉朝控制的农民数量极其巨大，直至文景时代才基本上被重新控制。人数众多的农民摆脱了控制，使汉王朝从农民阶级身上搜括走的赋役大大减少。例如，汉初每年运进长安的漕粮“岁不过数十万石”，而后来的武帝时则每年达四百万石。这也就是说，大批摆脱了控制的农民正是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不向汉王朝纳税服役，就使他们得以改善生产条件，扩大生产，此其一。许多摆脱了控制的农民或者进入了原先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或者进入山区从事冶铁等手工业。有关的历史记载表明，象吴国那样原先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有了发展，汉初冶铁等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都是直接依靠的这些“亡人”或“放流人民”，此其二。大批农民离开原先较为发达的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生产也是有利的。例如曲逆县，秦时三万户，汉初由于农民的“亡匿”，仅存五千户。这种情况大大改变了当地的耕地和劳动力的比例关系，从而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有一个较好的租种土地的条件，而有地的农民得以较为稳定地保持自己的土地。换言之，原先经济较为发展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汉初生产其所以有了发展，同样是秦末农民战争所造成的大批农民摆脱了汉王朝控制的产物，此其三。总之，只要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分析汉初生产的发展，那末，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秦末农民战争所造

成的大批农民摆脱了汉王朝的控制，才造成了汉初生产力的发展^①。如果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不以为然，那末，在这里我诚恳地欢迎批评，并且希望他们就汉初或其他时代的生产发展事实，而不是以理论概念，作出具体的解释。

自汉代之后，我国的生产力在不少方面还有所发展。逐个地去分析这些发展当然不是一篇序文所可能的。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南方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历史在汉唐之间的一个最巨大和最基本的成就。与此同时却出现了北方经济的逐渐衰落。先进和落后大体上以长江为界，在这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动。

究竟应该怎样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现象呢？

十分明显，用生产力或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动力又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经济获得了发展的南方本是生产力较低的地区，而原先生产力较高，从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也较为尖锐的北方则反而落后了。

用封建王朝的让步政策同样也是不行的。因为，一则除了若干南逃的腐朽小王朝之外，两汉、隋、唐等王朝不仅没有号召农民南移、发展南方的政策，反而是一直禁止农民离开北方；再则，这些王朝所实行的所谓“轻徭薄赋”的政策，如果真是货真价实的，并且发生了推动生产的作用，那末，北方正是他们统治的中心地区，至少应该更加有所发展，为什么情况恰恰相反呢？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谁试图强调封建统治者政策的作用，他就无法解开当时生产发展之谜。

南方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其实仍在农民战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农民反抗斗争。因为，开发南方的劳动力主要是在汉唐

^①参看拙作《秦末农民战争后的社会和汉初生产力的发展》，载《陕西师大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间历次农民战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中摆脱控制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

绿林、赤眉农民战争之后，东汉社会上也有人数众多的摆脱了控制的农民。东汉王朝在建武初年所控制的农民就只有西汉的百分之二十。大批农民或者“屯聚山泽”，或者“拥兵据土”。^①其中看来以远徙南方的农民为多^②。这样，当东汉王朝将这些摆脱了控制的农民重新控制起来之时，南方和北方的户口构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占全国户口总数仅15%左右的南方，现在户口数已经上升为40%以上，而原来占全国户口近85%的北方，现在只占60%左右了。

十分明显，在同一个汉王朝统治下的南北户口截然相反的变动，既不能从人口的自然繁殖，也不能用封建统治者的政策来加以说明。它只能是大批摆脱了控制的北方农民南移，后来被东汉王朝重新控制的直接产物。

东汉初年大批北方农民的南下，使我国的南方在封建时代获得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尽管封建史学家竭力抹煞劳动者的历史，但从现存东汉初年社会生产发展的典型事例，如桂阳郡、九真郡的冶铁业的兴起和牛耕的普及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创造了这些重要生产成就的主人正是“佗郡流民”^③，即摆脱了控制的农民。

东汉末至三国初是我国南方得到第二次大开发的时期。而这次开发的主力军则是继承着黄巾大起义而遍布于南方各地的所谓“江南宗贼”或“山寇”。例如，汉代的会稽郡包括今浙东和福建全省的土地，有十三个县的建置，控制着十二万三千零九十户人口。其中，整个今天的福建省，只有东冶一个县，

① 《后汉书·张宗传》、《后汉书·李忠传》。

② 《后汉书·郭伋传》、《后汉书·任延传》。

③ 《后汉书·任延传》。

估计决不可能超过一万户。然而当以洪明等七支“宗贼”^①进入东冶县所辖的建安一带时，人数即达六万余户。这就是说，仅东冶县的一个地区，当时的“宗贼”占东汉会稽郡控制的户口的一半。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种反抗农民系由“逋逃”、“宿恶”或“黄巾余类”^②构成的。他们或者“阻兵守界”，不接受封建王朝“所遣长吏”；或者“惟输租布于郡，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先前南方许多荒芜的地区就是被这样一大批所谓“逋逃”开垦成为“（财富）甚实，得之可以富国”^③的“小天地”的。

和以往历次农民战争一样，隋末农民战争的结果，也使唐王朝所能控制的农民即所谓“逃户”继续南下，从而极大地改变了隋时南北的户口构成。关于这一点，我在答戎笙同志的文章中已经约略地指出过^④。在这里我只想补充指出一点，这是继黄巾大起义后我国南方的第三次大规模地开发，而且这次开发的结果，使南方终于把先前先进的北方抛在后面，在我国封建经济中占据了先进的地位。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发展中最大和最重要的成就——南方经济发展，是汉唐一千年间历次农民战争和其它反抗斗争的直接结果。在我国史学界除了象吕思勉等一些著名的史学家之外，过去都不太注意这一点，因而就对东晋和南宋那样腐败不堪的小朝廷在开发南方中的作用做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评价。

中国的封建生产在宋代就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到明代则已经基本上陷入停滞，并且在此后的时间里，堕入了越来越深的

① 《三国志·贺齐传》。

② 《三国志·诸葛恪传》、《三国志·朱治传》。

③ 《三国志·太史慈传》、《三国志·刘曄传》。

④ 《“贯串于人类历史的根本性规律”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载《陕西师大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落后深渊不能自拔。与此同时，先前处于落后状态的欧洲国家迅速地发展起来，率先发展了新兴的资本主义。从世界的范围来看，正是在这个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与欧洲恰好更换了一个先进和落后的位置。为什么我国的农民战争自明以后的时代里，仍然规模很大，次数很多，但社会生产却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为什么欧洲国家并没有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偏偏较早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目前关于历史动力讨论中所提出的这个尖锐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明王朝于公元 1368 年正式建立，当时各地都有所谓“逋逃”、“流通”和“自躲避了的”百姓等等。因此，洪武之初，明王朝控制的户口只有一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比之元代全国的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零六户，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口，只及 12% 左右。说明当时摆脱了控制的农民和历代农民战争之后一样，数量是很大的。然而，为时不过十年左右，到洪武十四年，明朝的户口竟上升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四千四百一十二户，五千九百四十七万三千三百零五口。和洪武初相比，十年左右的时间竟上升了近六倍。和元朝相比，户为元的 81%，口占 101%。自此之后，明王朝控制的户口基本维持这个数目。所有这些现象表明：明初户口的迅速上升，并非人口自然生殖，而是明王朝控制摆脱了控制的农民的结果，而且这种控制不过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基本完成了。前面我已经指出，过去象汉唐王朝，大体经历了七八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基本完成这种控制的；如今明王朝却只不过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换言之，重新控制农民的速度特快，这是明初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让我们以长江为界，分南北两区，将元代和明洪武十四年的户口作一对比，那末，人们立刻就可以发现，在南方，明代比元代户减三百五十九万，口减八百二十四万；北方户增二十三万，口增九百二十二万。这样，元明之际南北方在全国

户口中所占的比重就发生了自汉以来绝然相反的变动：北方由元代的户占17.72%上升为25.51%；口占15.31%上升为30.29%；南方则由元代的户占82.28%下降为74.49%，口占84.86%下降为69.71%。换言之，就明朝已经控制的农民数量来看，自汉以来一直在增加的南方出现大幅度地下降，而一直在不断减少的北方却出现大幅度的回升。这是明初在控制农民方面出现的另一个显著的历史特点^①。

同是农民战争后摆脱了控制的农民，为什么明初的重新控制这样迅速？同样南北二块，为什么明代和以往各代出现截然相反的控制趋势？

从封建统治方面看，明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获得空前地强化，它拥有一架庞大的官僚机器和一支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职业军队，达到平均每四十九人就有一名士兵，同时，还有一整套集封建大成的政治制度。这一切使得明王朝能对当时摆脱了控制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得以实行空前严厉的控制政策。请看朱元璋的一道圣旨：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拏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拏来做军。钦此。”^②过去，在我国的史学著作中，往往对朱元璋和明王朝的所谓“招抚流亡”的政策大肆赞扬，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看看这道圣旨，人们就可以明白，动用“大军”和严刑峻法，去追捕和控制那些“自躲避了”的百姓，即摆脱了控制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才是明初户口能迅

^①参看拙作《明初户口升降考实》，载《文史哲》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②《戒庵漫笔》卷一。

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明王朝专制主义强化的典型表现。

（从客观经济条件方面看，自汉以来，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封建生产在广度方面接近了尽头。因此，先前在各种反抗斗争中摆脱了控制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还有广阔的南方作为一块可资开发的乐土；如今，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南方，已经取代了先前北方的地位时，摆脱了控制的农民除了很快被重新控制之外，甚至只能倒流到早已衰落的北方。这就是摆脱控制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在明初所以迅速被控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经济陷入全面腐朽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王朝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迅速控制，使他们立刻重新陷于封建地主和国家的共同控制之下。手工业者被匠户制度所紧紧地束缚，严重地阻碍了一切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农民则因为地租和赋役的双重剥削的压榨，几乎完全丧失了改善生产条件的可能性。尽管元末农民战争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使“大姓之家，嗷无遗类”^①，为改善当时的农民特别是北方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创造了条件，然而赋役增长速度却比户口控制的速度更快。仅以粮税一项来说，洪武十四年为二千六百一十万零五千二百五十一石，比元代每年一千三百一十一万四千七百零八石增加近一点二倍；二十六年为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八石，比元代增加了一点七倍。这样，明初的农业除了北方地区有所恢复，棉花的种植有所普及之外，就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 总之，元末农民战争和历代农民战争一样，造成了大批摆脱控制的农民。这本来是推进当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一方面当时封建经济在广度方面基本上接近了它的尽头，使当时农民已经没有象过去的南方那样的大片乐土可寻，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却使明王

① 《一山文集》卷六《房氏家传》。

朝有力量用最野蛮的政策——“大军点户”，去对付摆脱了控制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而一旦把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基本控制起来之后，明王朝又以比户口更快得多的速度增加对他们的搜括。试问：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怎么能不发生停滞呢？试问：造成明初生产停滞的根源难道不是专制主义的王朝及其反动政策，反而是元末农民战争吗？

如果说明初期的生产基本没有什么发展，那末明中叶之后，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纺织、冶铁等手工业生产，以及商业和海外贸易，都曾经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在隆庆、万历时代，甚至还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无法列举这些史学界所公认的基本事实。但我想指出，弄清为什么恰恰在明中期之后生产一度会有所发展，甚至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弄清为什么这种生产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不久即被扼杀，在我国得不到持续的发展，对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将更有益处。

谁都知道，自英宗以后，明代社会的基本状况是：一方面是明王朝的统治极其黑暗腐朽；另一方面是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摆脱了控制，成为流民。十分明显，前者决不可能是当时生产发展的动力，那末，大批流民的出现对于当时的生产起了什么作用呢？

当时流民的主要动向，一是冲破明朝的“禁山”政策，进入象荆襄、赣南和仙霞岭等等“禁流民不得入”的大山区；二是冲破明王朝的“海禁”，或据海岛，或下南洋、日本。据成化七年项忠的奏报，仅仅被他从荆襄山区一地“驱散”的流民即达一百四十四万多人，几占当时明朝控制的大约五千万人的3%。如此众多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其所以要离开本乡故土上山下海，当然是因为明朝封建统治的直接结果。问题是他们上山下海后究竟在干什么呢？只要稍稍研究过明史的人都知道：“缘此等逃户，始因躲避粮差，终至违悖德化，食地利而不输租赋，

旷丁力而不应差徭，弃故乡而不听招回，住他郡而不从约束。”^①简言之，第一，农民进入当时还存在的这些“土广人稀”、“可耕可麻”的禁山，“不特为流逋计，实所以利之”^②，即不税而耕。事实上大批历史资料都证明：这些禁山中的“俱有山田，询之士人，半系贼匪之所开垦，半系窝主……占业”^③。第二，手工业者进入这些山区，或者“因山开矿”，“啸聚千万人作事”，或者藉山林之资，从事着烧炭、造纸、制茶和榨糖等手工业。例如，“南赣地方，田地山场坐落开旷，禾稻竹木生殖颇著。利之所共趋，吉安等府各县人民，年常前来，谋求生理，结党成群，日新月盛。其搬运谷石，砍伐竹木及种靛栽杉，烧炭锯板等项，所在有之。”^④第三，那些下海的流民则“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经营着真正的海外贸易。冲破了明朝的山禁和海禁的广大流民，发展着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事实所在皆是，史不绝书。没有他们，就谈不上明代中叶的生产发展。但是，明王朝却把这些流民视为“山寇”、“矿盗”和“海寇”，杀戮、“驱散”、破坏，无所不用其极。使象叶宗留那样的所谓“矿盗”、刘千斤那样的所谓“山贼”和林道乾那样的所谓“海寇”，不得不停止生产，发动了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斗争。只要稍稍阅读一点历史资料，我想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批摆脱了明朝控制的流民是推动明中期以来生产发展的动力，而明王朝的反动政策和镇压暴行，则严重地破坏了这种生产，从而使当时的生产发展只能局限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

至于说到明代后期，那末，我想只要指出明王朝所派出的一大批所谓“矿监”、“税监”、“盐监”、“宝监”亲临当

① <孙司马奏议> 卷一。

② <图书编> 卷四九。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 卷八二。

④ 崇祯 <南海县志> 卷一二 <艺文志>。

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和矿场的事实就足够了。这批比饥狼恶虎凶狠万倍的东西，依仗皇帝的威权，“白昼手银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中人之家，破产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①于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其他工商、农业生产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使“平昔富庶之乡，皆成雕敝”的惨状。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黄宗羲说得好：“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的专制主义统治，这才确实实的是明朝一切生产发展的扼杀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先进转化为落后的根源。

一个人落后了，是可悲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落后了，更加灾难深重。然而，试看中国的落后是怎样来的呢？难道是因为中国在明代之前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其他国家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产生较早，我国的封建生产和科学文化均有较快、较大的发展，具有世界的领先地位，从而使封建经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于是在这样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整套充分发展的封建上层建筑——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又反过来成为维护封建经济、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力量。马克思说得好：“罗马人的强大是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强大。财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对财富起着破坏的作用。”^②

① 《明史·食货志》、《明史·陈奉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七七页。

这就叫做结果破坏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由先进变落后也是结果破坏原因的一个适例。

在这一点上，现代资本主义经历着与中国封建社会大体相似的历史进程。由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较早，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科学文化也就有最快最高的发展，在近几百年中一直占据着世界的领先地位，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在这样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于是就有一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反过来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力量。尽管由于它们迄今还有第三世界作为自己的原料、劳动力和商品的市场，生产还可能有所发展，甚至较大的发展，但是自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历史的方向已经显示得十分清楚：正如曾经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落后的西方国家，曾是资本主义的摇篮，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偏偏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落后的东方国家。

自汉以来直至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反复地证明着：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只有各种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否则，人们就根本无法说明为什么恰恰在英国、法国和刚刚立国的美国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在几百年中相继占据了世界的领先地位；也根本无法说明为什么象中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只占国民生产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民国家，竟比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早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

元代初年，伟大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周游中国，写成了一部详细介绍我国文明成就的游记，激起了西欧人对中国封建文明的向往。当时，欧洲还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前夜。马可波罗看不到中国和西欧正面临更换先进和落后地位的征兆，这是可以用历史条件来解释的。今天，当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我国胜利之后的时代，如果人们还看不到历史的这种跳跃式的曲折发展的基本趋势，那末，历史发展就势必成为他